

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语言学会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40-53
2658

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学术报告集



10060272

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语言学会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875印张 3插页 169,000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统一书号：9106·55 定价：0.90元

目 录

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王 力	(1)
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	吕叔湘	(6)
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与继承	严学宥	(21)
试论语文词典编纂工作	罗竹凤	(39)
语言教育研究的现状和展望	张志公	(56)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新情况	周有光	(65)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	王 均	(69)
关于我国的英语教学和研究	王宗炎	(102)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伍铁平	(121)
今日美国语言学	赵世开	(140)
语言学的新发展	刘涌泉	(150)
关于古文字的研究	赵 诚	(169)
对今后几年汉语方言调查工作的建议	熊正辉	(179)
谈谈句子成分分析法	李临定	(182)

附录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王 力	(193)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闭幕词	吕叔湘	(195)
中国语言学会章程		(198)
中国语言学会筹备经过	陈章太	(200)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纪要	大会秘书处	(203)

关于聘请中国语言学会顾问、名誉会长的决议…… (213)

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

常务理事、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 (214)

附录

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王 力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希望我发表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意见。我不好推辞，但是我要声明，这只是我个人一些粗浅的看法，不一定对。我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同志们不客气地批评指教。

一 要总结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

1956年曾经有过一个《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这个规划没有能够完全实现，首先是由于对我们的实力估计过高，后来又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批判为大洋古，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语文》杂志。于是，我们洋的东西不敢研究了，古的东西不敢研究了。我们不知道，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范围是很宽广的。研究洋的东西、古的东西，有的成果在短时期内很难适应实践的需要，但是，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发展有用的，就不能说是脱离实际的。今后我们制订规划，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

实施的情况不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研究面过窄，深度也不够，方法比较陈旧。这些教训也要总结，并防止在今后的规划中再出现这些缺点。

二 要研究语言学本身发展的情况

我国的语言学是从传统的语文学来的，至今还没有完全从语

文学里分离出来。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发展，向精密和综合方面发展，而且跟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例如出现了社会语言学、工程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即使研究语言本身的应用，同社会、同我国四个现代化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新兴学科的出现，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我们要快步赶上，发展我国的语言学。

我们不是把语言学和语文学对立起来，更不是主张语言学取代语文学。相反地，传统的语文学还是要有人研究的，因为传统的语文学对汉语的研究大有帮助。例如我们研究汉语史，没有语文学的基本功，汉语史是研究不好的。我们应该根据普通语言学的原理来研究传统的语文学，使我国的语文学得到继承和发展。

三 要研究世界的先进成果

我国的语言学还是相当有基础的。我们不盲目崇洋，但外国有用的东西，我们完全应该借鉴。我们不仅要研究外国的先进成果，还要研究外国语言学发展的原因。我们认为，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学上一些新的学说，如果是有价值的，马上就成为全世界的文化财产，不是哪一个国家所专有的了。我们要知己知彼，要站得高一些，积极地、全面地介绍和研究外国语言学。

我们再也不要“把‘资产阶级语言学’的帽子扣在人家头上了”。我们认为，不但语言没有阶级性，语言学也没有阶级性。语言学是介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科学，语言学的某些部门，例如实验语音学、数理语言学，简直就是自然科学。我国借鉴外国语言学，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我们不赞成生搬硬套，也不赞成一概否定。我们引进外国的先进成果，等于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必须先学会人家的，然后才能超过人家。

四 要扬长抑短

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基础好，或者研究条件好，这是我们的优势。要发展这些优势，这也是发展我国语言科学所需要，甚至是发展世界的语言科学所需要的。例如：

1. 汉藏语系的主要地区在我国，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具体语言的研究成果，或者在这个基础上丰富普通语言学理论，都是我国四化所需要的，也是世界的语言学发展所需要的。

2. 我国方言复杂、丰富，方言研究也是我们的优势。

3. 在古文字学方面，我们得天独厚。甲骨金文是世界最古的文字之一，除了古埃及文字和梵文之外，恐怕无与伦比。近年出土文物中也有许多古文字。这是我们研究古文字的有利条件。古文字研究好了，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史、汉语史，可以考证上古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

我们要抓住这些方面有可能产生研究成果的题目。

但是，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扬长抑短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所短的，就不要研究了。

外国语言学有的，我们不一定都得有，更不必都得超过他们。但是，在各国都应有的，都需要的方面，我们不应该落后。落后了就是我们的短处，就要在这些方面赶上去。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比较薄弱，甚至有空白，方法比较陈旧。大部分同志对新的研究方法还不怎么熟悉，例如对描写语言学、历史比较法、统计语言学、结构主义等。我们需要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五 要保证重点

语言学要研究的课题很多，要做的语言工作也很多。长期以来造成重理轻文，重文学轻语言，语言工作者的队伍很小。人少事多，就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四面出击，分散兵力，打消耗战，那是不行的。我们要照顾到面，但要保证重点。

我们长的方面和短的方面都应该有重点。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根据国家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有一些重点。

1. 现代汉语。为了解决当前的许多实际问题，要求加强现代汉语的研究，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专题研究，其中包括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和研究，汉语规范化的研究。

2. 民族语言。除对各兄弟民族语言的深入研究外，要把各民族语与汉语的对译词典列为重点。

六 要实事求是

规划要体现出我国语言工作者的志气和干劲，要和我国现代化的规划相适应。但是这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1956年订的规划实施得不好，规划本身订得有点飘，也是一个原因。如果规划本身成了说大话的东西，自己也不相信，那还有什么用呢？我们要考虑到现有的和十年里能有的人力、物力等条件。规划不能太笼统，太原则，主要的项目要落实。要有题目，主要内容，负责人，完成时间。完成时间可以有先有后，不要都放在后五年里完成。但也不宜规定得太细，太死，缺少弹性。主要项目如何完成，都要有措施保证。

七 要大力培养干部

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从长远来说，要靠青年。从现在起，就要培养一批二十来岁的青年语言工作者，让他们在年轻时就打下广泛而牢靠的基础。大学招生可否考虑挑选一些语文（包括汉语和外语）和数学都较好的学生呢？艺术、体育、外语等高等院校可以挑人，语文方面为什么不可以也适当地挑一些呢？

可以考虑适当地集中力量在几所有条件的大学办语言系，开设较全的课程。现在培养的人才都有点瘸腿，社会科学方面的逻辑学、统计学、社会学等不怎么会，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物理学、生理学等也懂得不多，不合现代语言学的要求。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不懂得数理化上。目前可以在语言学专业里多开一些课，教师可以借用。开进修班，请有关大学的专家讲课，也是一个办法。

还要大力培养和挑选研究生。

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可以在当地社会科学院（所）里设置语言研究所（室）。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中文系也可以设置语言研究室。高等学校教研机构的教师以教学为主，也搞些研究；研究室的教师以研究为主，也教一些课。不要实际上是教研组室而挂研究单位的牌子。研究人员不要兼职太多，要真正搞研究。研究机构哪怕暂时小一些，人少一些，但一定不要徒有其名，而要讲求实效。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是否妥当，是否切合实际，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

吕叔湘

—

这多少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还做得不坏，但是总的说来，不够多，不够好，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今天我想谈谈如何把我们的语言研究工作再往前推进一步的问题。主要谈汉语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方面。

我觉得要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就是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和专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中和外的关系，也就是中西结合问题。很多学科有这个问题，比如美术有中国画和西洋画的问题，音乐有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的问题，医药方面有中医西医的问题，语言学也有这个问题。有些学科结合得比较好，有些学科结合得不那么好，语言学上的中西结合有一定成绩，但是还不很圆满。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中国的语言学传统，严学窘先生将要在里做专题报告，我就不多说了。简单地讲两点：第一，中国传统语言学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研究秦汉以前的古书。有时也对“俗语”做些考证工作，多少有点业余性质，如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章炳麟的《新方言》等等，

* 根据1980年10月22日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的记录改写。

一直到1920年还有一位方毅先生出版一本小册子《白话字话》，都是站在文言的立场，用文言来解释白话的。第二个特点是以文字为中心，把语言的研究包括在“文字学”之内。从前老北京大学的讲义有《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西方的语言学传统，起初也是以古典语言为对象，后来转移到当代语言，近二百年又扩展到多种语言的比较研究。西方的文字只是声音的符号，没有象我们的文字学那样的学问。他们也有古文字学，只是辨认文字形体，是史学和考古学的辅助学科。西方的语言学传统可以说是以广义的语法学为中心，十九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二十世纪产生了一般性的语言学理论即所谓普通语言学，又有比较语音学。这些都是跟多种语言的研究分不开的。中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研究的对象基本上局限于汉语。

以上说的是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传统的差异，现在来谈谈结合问题。西方语言学闯进中国可以说是从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开始，以后又有基督教（新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方言，这些对于清末民初的切音字运动都有影响。语法方面，从十九世纪末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一直受到西方语法学的影响。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结合，而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觉得，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古音的构拟上，因为把传统的声类韵类的研究跟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方言的结果结合起来，就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跟这个比较起来，语法研究的成绩就要差些，很可能就是因为套用现成结果多了些，钻研方法少了些。

有两种偏向我想提一提。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当然不能说这样进行研究不会有收获，但是可以肯定说收获不会很大。要知道现在中国学问已经成为世界性学问，很多国家里边很多学者在那

里研究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艺术。他们在方法上，有时候甚至在材料上，有胜过我们的地方。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不一定全都接受，但是至少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如果有的问题别人已经替我们解决了，我们却还在暗中摸索，岂不可笑？

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介绍外国的学说当然需要，我们现在介绍得还很不够，但是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就讲介绍吧，也要下一番融会贯通的功夫，枝枝节节、依样画葫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所以会有这两种偏向，主要是由于学习途径不同（中文系，外语系，自学），传授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偏向总还得说是偏向，对于推进我们的工作不利。如果从中国传统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吸收西方语言学方面下点工夫，如果从西方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结合中国语言实际上下点功夫，那就最好。

二

其次，谈谈虚和实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事例的关系（这里说的“事例”，用科学家的术语就是“数据”）。理论从哪里来？从事例中来。事例从哪里来？从观察中来，从实验中来。不管做哪种学问，总不外乎“摆事实、讲道理”六个字。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你要观察它，才能认识它。拿语言来说，每个人每天都接触到大量的语言材料，自己说的话，别人说的话，多得很，数不清有多少。如果你不用心观察，就只感觉有那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用心观察，就会发现语音的组合有一定的模式，词语的组合有一定的规律。把这些模式和规律系统化，就构成理论。

观察语言现象，除了直接听人（包括自己）说话以外，还有书面材料，就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过去研究语言的人偏重书面材料，忽略口头材料，这是不对的。口语至少跟文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口语更重要，因为口语是文字的根本。研究自然科学，除了观察，还常常进行实验，研究语言能不能进行实验呢？语音可以用仪器来测量，这可以算做实验。语法方面，语义方面，可以提出问题，这样一句话能不能说，这个字眼跟那个字眼能不能搭配，拿来征求别人的意见，这个一般叫做调查，也可以算是一种实验。也可以用来征求自己的意见，那就是反省。

如何对待前人的理论？讲语言的书已经很多了，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有关语言的理论了。怎样对待它？科学成果是累积起来的，白手起家是困难的，并且这个时代也早已过去了，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但是，对一个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前人的理论无论多么重要，都只是一种参考，要用自己的观察来验证。不能奉为神圣，那样就没有进步了。并且，前人的理论往往有分歧，有矛盾，你把哪一家奉为神圣呢？中国从前做学问的人讲究“家法”，讲经学有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讲理学有程朱之学，有陆王之学，各种学派多得很。外国也是这样，目前就有结构主义学派，有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派之中还有派，结构主义有日内瓦学派，布拉格学派，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如此等等。讲“家法”有好处，免得拼拼凑凑，不成名堂，甚至自相矛盾，但是也有缺点，容易墨守成规，拘拘于一先生之言，不敢越雷池一步。禅宗和尚很有意思，他们一方面常常问“宗风嗣阿谁？”就是问“你是哪一派？”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呵佛骂祖”，连释迦牟尼都不放在眼里，求解脱（那是佛教徒的“真理”）还得靠自己。这种精神还是值得佩服的。

我们说理论从事例中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事实，也就

是材料，决定理论。例如中国音韵学里边讲反切，讲等韵，都跟汉语、汉字的单音节性质有关。又如汉字的构造产生文字学，拼音文字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文字学。

理论和事实比较起来，哪一个更重要呢？这个问话好象是多余的。因为理论是理性知识，对事实的认识则仅仅是感性知识，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理性知识当然高于感性知识。但是如果没有感性知识做基础，那个理性知识就靠不住，就可能是骗人的玩意儿（连本人也是受骗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理论不是凭空得来的。他进行了多年的观察，他在贝格尔号船上航行五年，在南美洲和南太平洋的海岛上考察各种生物形态，他在自己的园子里培养各种植物，观察它们的变异，逐渐形成他的生物演化的理论。没有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就是达尔文那样的天才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理论。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从前明朝时候有两位理学家，一位姓刘，一位姓丘。姓刘的讥笑姓丘的，说他只有一屋子散钱，可是没有一根钱串子（绳子），意思是说他写了些书，里边琐琐碎碎讲了不少事情，可是没有一个大道理把它贯通起来。姓丘的针锋相对作了回答，他说，刘某人倒有一屋子钱串子，可惜没有一个散钱，意思是说他空讲大道理，没有事实依据。^①你们说散钱和钱串子哪个重要呢？当然成串的钱最有用，可是如果二者不可得而兼，那末，散钱虽然不便携带，捡起一个钱来还有一个钱的用处，光有绳子没有钱可是毫无用处。

话是这样说，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你去发现事实。当门得列耶夫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的时候，他排列的周期表上还有不少空位，后来都填满了。同类的例子科学史上还有。

当然，既善于观察，又善于贯通，这是最理想的了。可是人们做学问总难免有所偏，或者比较善于观察现象，搜罗事例，或者比较长于分析条理，组织系统。可以以一方为主，兼顾另一方，

不可走极端，走极端就不会有成就。

我有一个印象，喜欢搞理论的人多，肯在观察、实验上用功夫的人少，特别是在青年同志里边是如此。别人也有这样的印象。已故的北大饶裕泰教授曾经深有感慨地说：现在的物理系学生十个有九个喜欢搞理论物理，他们不去想，实验物理跟不上，理论物理也就上不去。我看语言研究，至少是语法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向？我想，这是因为搞理论可以得到一种美学上的满足，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过瘾”。你看，化学元素周期表，原子核模型，美不美？美得很啊！语法体系不是也可以搞得很美吗？观察呀，实验啊，既零碎，又枯燥，腻味死了！然而，没有办法：不搞观察和实验就产生不出理论。

其实啊，且不说实验，光是观察也并不容易。记得小时候念英语课本，有一课书的题目叫做“有眼与无眼”，说的是一家人家弟兄俩小孩出去游玩，回家之后，大人问他们一路上看见了一些什么东西。哥哥什么都说不出，弟弟却什么花，什么树，什么虫，什么鸟，说出来一大串。观察语言现象也是这样。有人看出来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有好例子，有人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例子也没有。到了写文章的时候要举例，就随便造两句，照着既定的格式往里填，很生硬，不象实际语言里的东西。观察事物的本领也是学来的，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的有名的《近代英语语法》七大本，正文三千四百多页，每页的例句算它二十个吧，就有将近七万个，都是经过挑选的，假定两个例句里边选用一个，就得抄下十四万个例句。做任何学问都要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观察事物和做实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不可有成见。一个人做学问不可能没有一些看法，但是当你进行观察或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把你那些看法暂时忘掉。有科学家说过：“要把一切成见留在实验室的门外。”关于观察，也有人说过：“你只会看到你想看到

的东西。”对于反面的例子，有人硬是“视而不见”。当然也有人是有意识隐瞒，那是不老实，更加不好了。总之，无论观察还是实验，都要把脑筋擦干净，让它象一面一尘不染的镜子。还有，进行调查也要注意不要给调查对象任何暗示，哪怕是不自觉的。比如你去调查一个地方的方言，不要问他“你们管西瓜叫什么？”这样问，哪怕那个方言里边不叫西瓜而叫什么别的，他也会回答你“就叫西瓜”，因为他怕说出土名来招笑话。你可以对他说：“有一种瓜，圆圆的，外面是青皮或者花皮，里边是红瓤或者黄瓤，有很多小瓜子儿，味道很甜，你们管它叫什么瓜？”这样才能得到你要得到的名称。

这样看来，喜欢搞理论而不愿意进行观察和实验，可以有两种动机，或者是追求虚无缥缈的美感，或者是逃避辛勤劳动。不管是哪种动机，都不利于学问的进步，很容易使人成为一个空头理论家。

难道不能利用别人观察、调查、实验的结果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当然可以。可是人家不会光把观察、调查、实验的结果端出来，不加分析，不作假设，专诚准备你去利用。只有极聪明的人才能够看出人家没看出来的道理，这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

三

第三个问题是动和静的关系，指的是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是边缘科学和中心科学的关系。近代语言学的发展，拿它的主流来说，是理性语法——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总的说来，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本身，研究的方法是静态分析。

静态研究很重要，是根本，但是不应当到此为止，用一堵墙把自己圈起来。语言不存在于真空，语言是供人们使用的。研究